

# 前 言

## 一、一个定义问题

是休闲还是娱乐？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字用复数，这里我们已经发现，要在这个神奇的字后找到一个单一的定义是困难的。这个字常在演说中出现，像人生中享有特权的时刻在回响。

由于缺乏完整的定义，我们只能将休闲这个字的几个主要含义理一理。

用作复数时，是指根据个人的愿望和爱好所自由选择的活动。即使某些活动占了主要地位（体育、旅游、电视）休闲活动的范围实际上是无限的因为它取决于每个个人的动机。

用作单数时，休闲可有两种含义：第一、是将休闲与休闲的时间等同起来；第二、休闲首先甚至是独立于可能填补这一可自由支配时间的活动的空闲时间。总之“懒惰”、“无所事事”都可当作休闲度过。但

是，休闲时间不能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混同于业余时间。形形色色的义务插入就业时间，并“干扰”休闲的自由支配时间：

——随着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距离的扩大，交通时间也随之延长；

——家庭或社会的义务（比如行政活动），还有为满足生理需要（睡觉、吃饭等等）的必要时间。

这个“受限制的”时间加在就业时间上，就减少了娱乐这一实际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部分。

通过对法国人时间预算的研究，对典型的一天平均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作出如下估计：

——就业男性 3.8 小时；

——就业女性 2.8 小时；

——无业女性 4.4 小时。

这只是估计，因为存在着如何精确地估计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问题。

家庭活动是属于受限制的范围还是自由选择范围？一般情况下，两个部分是经常掺和在一起的，因此有些作者如 J. 杜马兹迪埃，建议给这些活动一个混合性的名词：“半娱乐”，它说明以严格的方法理解休闲时间和与之有关的活动是困难、模糊的。

另一些作者，如 M. 卡布朗，为了避免这一困难，选择了解释休闲的第三种方法，不用休闲活动的

内容或其发展所需的时间来下定义。

任何活动 只要是自由选择 并为个人在进行这一活动的过程中能谋得自由这样一种感受的都属于休闲范围。

由此，休闲将首先是个人的一种心理态度。

以这个定义为标准，任何活动都可以当作是一种娱乐来完成，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人在进行这项活动时的精神状态。根据这种观点，甚至工作都能够带有娱乐的形式。

当然 在谈论休闲时 必须从这 3 个互补的含义的整体来考虑。

## 二、一个社会问题

初看起来 休闲特别与个人有关，因为它取决于他的自由选择，他的自由的行使。但是，各种社会决定论相对地影响着个人的选择。此外，由于休闲所取得的规模，它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劳动时间逐步缩短，空闲时间的增加，涉及各类就业人口。

过去是次要的空闲时间现在成为重要的时间，不仅是因为时间延长了，更是因为它代表了满足各种需要的享有特权的时刻，因为就业生活单一化，机

械化，给予工薪者自我表现以越来越少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休闲与就业对立，它是工作的解毒剂。

随着空闲时间的增加，休闲实践变得紧张，它不再是继就业时间之后的“松闲”、空余时间。它不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劳动体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

休闲表现为个人或集体的积极实践，由于这些实践的扩展及其所需的基础设施，使休闲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以法国旅游业的发展为例：每年外出度假的法国人越来越多，外出率已超过了 60%。周末或短期假期外出的增加更说明问题。体育娱乐发展更令人吃惊，法国人自发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无法统计。（在这方面，慢跑的例子是很有趣的，刚开始是一种时尚现象，它却出乎人们预料地延续和发展起来。）

当然，不是所有的休闲活动都得到了如此的发展（某些文化娱乐甚至在倒退），而且它们在不同层次的人中的分布也不均等，这个问题稍后再谈。

但是，休闲权已成为基本的社会需求。各工会，特别是法国民主工联都意识到了这点，都在有力地支持所谓“质的（缩短工作时间、降低退休年龄、改善生活和娱乐质量）要求”。

尽管娱乐发展很快，但它们并没有达到一些人在 60 年代初预计的它们将占据的地位。

当时人们谈论一个未来的“娱乐文明”因为一个以休闲为基础的新社会，将取代以就业为基础的工作社会显得如此必然。这个神话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能最终解放人类，使其投身于娱乐的富饶社会或是产业革命后社会。现在，这些预测错误的原因已很清楚了：经济增长减缓；财富朝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石油输出国重新分配；浪费的增加；经济体制不能走出为生产而生产的逻辑，生产所创造的和毁灭的相抵消。

所有这些因素阻止了能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产业革命后社会的到来。

今天 我们是否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 娱乐不能引起人们所期待的个人解放和充分发展？

相反，娱乐好像越发起着社会变革原动力的作用，而且可能孕育一个与工业增长的传统模式相反的新的社会模式。换言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由经济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发展生产力，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想法是虚幻的。

显然，通过有利于时间解放和娱乐扩展的社会运动而引起社会的逐步改变，倒是可能的。有些迹象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允许全面地提出休闲问题。

第一个迹象，空闲时间的缓慢上升，确实有利于劳动和娱乐间的某种重新平衡，且这种运动是不可逆转的。同样，休闲时间的“积极”使用引起休闲要求的增长，娱乐呼唤娱乐。此外我们还看到，不仅休闲预算在家庭开支中比其他预算增长快，而且在购买力停滞或下降时期，休闲项目保持稳定，休闲支出成了家庭预算中不可压缩的支出。同时，娱乐业在法国是最景气的行业之一；

第二个迹象，工资增加和空闲时间增加的调整。根据传统，法国人更愿意增加工资而不是空闲时间，而目前的运动则相反。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 1978 年 11 月进行的测验表明，55% 的法国就业人员情愿干一半工作而不愿增加一倍工资。46% 的工人赞成这种方法，42% 的人宁愿增加工资。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倾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继续，并随着不平等的逐步缩小而普及；

第三个迹象，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些休闲活动对集体起着不可缺少的社会作用。人们没完没了地列举促进公共利益的协会（互助协会、环境保护协会、或消费者协会等 其成员都是自愿尽义务的）由这些协会来填补国家（地方行政部门）或私营企业认为这个经营范围无利可图的空缺。此外，一些个人或在协会范围内进行的休闲活动，就是由自己来完成

成专业企业要高价完成的事情（室内装修、油漆、修理工程等）。这就是有名的你自己来干的时髦。

我们看到，休闲活动可以以非强制劳动的形式取代商业部门。在商业部门外，逐步地出现一个由互助协会、合作网形成的部门，人们来此“休闲劳动”施展自己的特殊才能。

此时劳动和休闲的界线变得模糊了。如果以不同的方式组织劳动，为什么劳动不能成为休闲呢？

休闲的未来赌注之一，可能就是在一个不再仅仅依附于资本商业支柱的混合体制中，它逐步替代劳动。

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都有这种劳动和休闲的替代 / 调和思想，这种思想有其现代性。

# 第一章 各种休闲观

## 一、休闲的起源

乍一想，人们可能会说，休闲早就存在，它与日共存，与时代共存。

这种说法只是部分正确。所有社会都有空闲时间，在某些社会中，空闲时间比我们目前拥有的要多得多。但是否就此能将空闲时间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休闲时间相提并论呢？不能。因为休闲观随着各时期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而大大改变。这不允许任何混同，但能作比较。

希腊人和闲逸。人们总倾向于把希腊文明看作为黄金时代。休闲也不例外，人们很自然地将这种文明称作使人在休闲中得到实现的文明之一。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不就是确定了一个能在哲学、艺术或体育的自觉实践中自由发展的人的原型吗？

希腊公民过着一种只有他“高贵”潜在性的充分表现才是至关重要的有闲生活。这不可能与劳动有关，因为劳动被认为使人失去尊严，为此它属于奴隶等级。任何劳动形式与希腊公民的状况相违背。劳动和休闲互相排斥，它们属于两个毫无关系的不同范畴，即使说到底是一部分人的劳动才使另一部分人能休闲。

劳动 / 休闲的这种排斥关系在词源中就存在：休闲在希腊语中为 *schole*，意为休闲和教育，我们看到这两种概念的接近，一些人继续将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发展娱乐，从中得益与文化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休闲的这种精华涵义以一定的受教育程度为前提，至今还存在，并将有社会价值的娱乐区别于其它娱乐。*A-schole* 则指劳动，奴隶状况。在拉丁语中，我们同样能找到这种排斥关系，因为 *otium*（休闲，闲逸）的反意为 *neg-otium*（字面意为事务，商业，劳动）。

因此，希腊人所理解的休闲包含属于某个等级（是希腊公民并且是男性）所享有的闲逸状况，所以说闲逸比休闲更恰当。目前我们所说的休闲并不排斥劳动，相反，劳动是创造娱乐的条件之一。

正如 J. 杜马兹迪埃所说：“休闲并非游手好闲，它不取消劳动，而必须以劳动为前提。”

此外，今天的休闲不再是一少部分人、一个等级甚至一个阶级的特权，而是全体人民都有休闲权，虽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

在产业革命前社会中，我们找到同样的划分：一个将其时间化费在休闲上的有闲等级和献身于劳动的广大被奴役的群众。在这些社会中的空闲时间不能与现代的休闲相比。是气候转变的结果，是气候不佳的季节的结果，因为农业劳动无法进行，换句话说这个“空闲的”时间不如说是受限制的时间 因为是接受而不是选择不劳作。这种强迫的不劳作是当作不幸度过而不是可能的休闲源泉。很少的“放假的”日子是教堂强加予人的，经常违背农民的愿望。尽管这些宗教节日经常转变为异教徒的节日，农民此时纵情于更自发的表现，但并不因此就是我们所说的休闲。这些节庆的强制性特性，仪式化使农民服从于排斥参加者自由意志的标准。制度无处不在，并监督尊重节日，但对可能造成的差异视而不见，因此不存在一个保留给娱乐的相应的时间。

19世纪和休闲的一代。随着第一批产业社会的出现，劳动的性质变了，但并不因此而释放一个休闲的相应时间。工厂的雇佣劳动逐步使人接受，引起农村移居。生活条件改变了，农民发现农村的劳动是断断续续的，而城市是连续的劳动。也就是说，

劳动只给个人留下起码的劳动体力再形成的时间，它对个人的压力将加大。其实不该忘记，社会立法的建立化了很长时间，劳动时间的缩短是逐步的。直到 1841 年 3 月 24 日才有了一个法律限制 12—16 岁的孩子每天工作 12 小时，12 岁以下 8 小时。至 1884 年的瓦尔德克—卢梭法，工会才有建立的自由而每日工作 10 小时的限制到 1900 年 3 月 30 日才出现。

在意识形态方面，劳动成为社会体制的中心价值。建立在这种价值之上的新社会看到一个资产阶级的上升，它抨击游手好闲者社会的寄生虫。19 世纪的经济学家证明，为创造使经济腾飞的资本有必要积累劳动。

这种劳动的意识形态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劳动道德，它继承了新教的清教主义，在韦伯的著作中也能看出这种劳动道德。

为拯救自身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劳动的严谨作为道德责任强加于个人。同时，休闲从经济和道德两方面受到批评。从经济角度讲，因为休闲是不生产的，相反还刺激消费。在 19 世纪，整个经济体制倾向于积累，因而倾向于加强新兴资本主义的节俭，这是一个生产社会对休闲的谴责。它与我们所了解的消费社会相反，后者鼓励休闲，因为它能成为扩展

因素。从道德角度讲，休闲同样受到指责，因为与劳动的严格道德相比，它使人习惯于闲逸、放纵习俗、产生不正常行为。

甚至像圣西门这样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也谴责休闲并有一种极其“经济学家”的社会观。圣西门不是以道德的名义，而是以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主义摒弃休闲。游手好闲是对社会，对组成社会的所有成员，首先是工人犯罪。圣西门认为，只有发展经济生产力，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基础。为确保发展，必须使生产避免立即消费，这种节俭引起新的生产投资，它们本身就是有一天使公平分配成为可能的足够财富的生成元。这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的思想不同，他写了一本有名的书题为《怠惰权》（1884年）。拉法格认为，休闲是资产阶级范畴，它为取代了贵族的这个新等级所保留。资产阶级的休闲更激起反感，因为它与这些有产者自己声称的劳动的清教徒的道德背道而驰，因为它建筑在无产者的剩余劳动之上，因此是建筑在对他们的剥削之上的。在这里，拉法格重新采用了马克思有关剩余价值的分析，他将有产者的闲逸习俗和费用浩大的消费，与无产者精疲力竭的劳动对立起来。

为与有产者的休闲作斗争，拉法格劝告工人自己缩短劳动时间，诉求怠惰权，资产者为了保障他们资本的赢利性，将同样被迫参加劳动。拉法格像巴贝夫在一个世纪以前那样，诉求的是劳动面前的平等。在此，并非有关所有人的娱乐权，而是面对劳动的条件均等。因此，我们不能将怠惰权与娱乐权混淆，怠惰或自主缩短劳动时间是与社会不平等作斗争的一种破坏性武器，这种不平等表现为一部分人休闲而另一部分人倍加劳动，这个怠惰的主题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所维护的全体罢工不无亲缘关系。

在马克思自己的笔下，休闲这个词很少出现。空闲时间正好是劳动体力再生产的必要时间。而如果劳动者得以缩短劳动时间，那末这一被解放了的时间仅用于劳动体力再生产的扩大，使对劳动者的剥削更为有效，因为他得到休息而更有生产力。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休闲从未以其本来面目来分析，而是从劳动这个中心概念出发来分析的。马克思的人被劳动异化的观点，例如休闲时间不能避免这种异化，但不能体现其生存的一个特殊方面。总之，马克思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联想中给娱乐以地位。一个这样的社会能消灭强迫劳动，即被剥削劳动。只有当活动是由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意愿自由选择时，人类的活动才能称为休闲活动。在这种

假设中，劳动和休闲才能混淆。

第一部毫无拘束地谈论休闲的著作是维布伦的《有闲阶级论》写于 1899 年。维布伦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证明了休闲和消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对维布伦来说，有闲不再是一种依附于出身的状态，贵族的有闲等级已时过境迁。新主宰的资产阶级，尽管他们的意识形态使劳动成为新的社会体系的中心价值，但他们梦寐以求的只有一件事：模仿旧贵族，和旧贵族一样，他们就想通过休闲来达到说明他们新地位的目的。休闲首先是消费时间，新有产者利用一切机会，惹人注目，以显示他们的不劳动。特别是对奢侈品或他们所付价格昂贵、无用的东西那无节制的消费，以此向大家显示其新地位使他们能得到的东西。维布伦在这个主题上使用了“炫耀的消费”一词来表示。这种休闲和炫耀的消费是阶级的象征，社会差别的迹象。必须将维布伦所描写的休闲消费和人种学家观察到的原始社会中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观念进行比较，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超消费，挥霍是确定个人社会等级的表示。维布伦将他的分析扩大到对诸如打猎、体育之类的休闲活动。这些活动需要时间 尤其它们是“无用的”正因为无用，它们才标价很高。

从维布伦的研究中，我们主要抓住两个方面，是

当前休闲很好的入门：休闲可能是阶级的象征，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很多休闲活动象征着社会属性。休闲也进入消费，一定社会地位不可缺少的休闲设备也列入竞赛之中。休闲表现为神经质地消费被认为能带来新的满足，其实他们只是服从于一种社会差别的心态。购买流行的最新型的照相机或最时髦的立体声成套音响设备，不是一项简单的个人满足的买卖，在别人面前，他从中得到的声誉对此有很大的影响。

## 二、现代休闲的特点

现代休闲有 3 个主要特点：一是物质特点 用来进行娱乐的相应的自由支配时间；二是社会特点，娱乐在全体人民中的普及；三是制度特点，一些娱乐由行政单位负担。

空闲时间增加。为使休闲活动能在全中国范围内发展，必须从生产活动中抽出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为的是不完全被满足生理需要或各种义务耗费。我们已经说过，它们代表一个受限制的时间。休闲活动“腾飞”的第二个条件，是有可能拥有一个相应的空闲时间。其实每天为休闲释放一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不足以保证我们所考

虑的娱乐的发展。是先拥有整整一天，然后是一个周末，最后是几个星期假日的可能性，刺激了娱乐的真正飞跃。在法国，周平均工作时间在 40 小时左右。法国的日工作时间在欧洲最长，相反，假日天数在法国要比邻国多。

现在，每周五天工作已经确认，由此创造了这一市民用来度周末的相应时间。有时在雇工的要求下，一些企业制定了 4.5 或 4 天工作制以延长周末。当然，在多数情况下不存在明确缩短工作时间的问題，因为雇工必须在工作日内完成更长的工时。这更像是时间的不同分配，但是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新分配是根据娱乐的组织，而不是根据生产的约束而定。这种颠倒，证明娱乐在社会组织中地位在上升。很明显，工作时间的缩短在美国快得多，每周 4 天工作制逐步普及，在某些部门，工作时间已降到了每周 30 小时。

在工业化国家内，无疑其趋势是缩短工作时间，因为失业的增加引起就业人口内部劳动力的再分配。

随着学习期、培养期的延长，而在另一端，退休年龄的下降，一生中就业工作时间的缩短更为明显。

但是，工作时间的缩短比预料的要缓慢得多。对 1980 年作了多少预言，每周 30 小时工作制显得

极其可能，至于到 2000 年，一切设想都允许。1936 年马提翁协议制定 40 小时工作制后，直等到 1982 年，法定周工作时间才缩短为 39 小时，并逐步走向 35 小时。相反，假期则从 2 周增加到 4 周，然后是 5 周。同时，延长周末“桥”<sup>①</sup>日益被接受。但总的来说，工作时间的缩短是相当缓慢的，与人们为 80 年代想象的各种“情况”不符。

如何解释这些预测的错误和休闲时间最终有节制的增加呢？有一些因素要考虑进去，只需列举主要的生产力状况、国际竞争、工会的力量。

五、六十年代的未来学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归功于生产率的上升，一个以机器代替人类劳动的产业革命后社会必然会到来。这种演变的必然结果是空闲时间的增加和娱乐文明的出现。在生产率进步方面，预测基本正确。1936 至 1978 年间，生产率提高了 4 倍。换句话说，相等的生产，在 1978 年需要的时间是 1936 年的 1/4。由于工作时间只少量缩短，生产率的进步几乎都用来提高产量而不是空闲时间。与预测的相反，机器没有取代人类的劳动。劳动的性质变了，生产活动被监控活动和三产活动的膨胀所取代。荒谬的是，现阶段人们担心机器代替人类劳动，因为人们还不懂得用缩短劳动时间来解决失业问题。